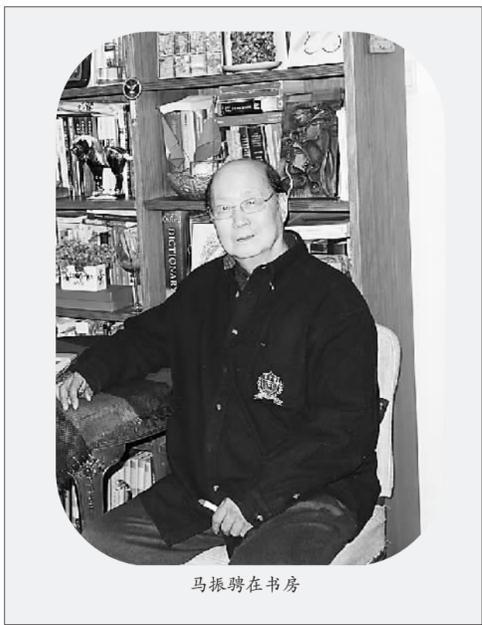


翻译家马振骋—— 播撒法兰西文化的种子

周洋文/图



马振骋在书房

上海有一个思南读书会。每逢周六，申城的爱书人便汇集于此，邂逅一本好书或聆听名家讲座。

今年2月，思南读书会举办两周年庆典并评选年度读者，82岁高龄的翻译家马振骋被评为“年度荣誉读者”。

笔者和其他5位读者也有幸忝列其中，大家对马先生表示祝贺，并希望有机会参观他的书房，马先生便非常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

马振骋先生家位于沪上一幢闹中取静的高层公寓内，从他的书房窗口望出去，美轮美奂的浦江风景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

先生书房里的藏书以法国文化类居多，既有雨果、福楼拜、莫泊桑等作家的经典名著，也有波德莱尔、保罗·策兰等现代派诗人的诗集，还有法国政治哲学、古典音乐等方面的书籍，装满了4个大书架，分列在书房的四壁。

其中有一格，都是先生自己的译著，《人的大地》《小王子》《镜子中的洛可可》《蒙田随笔全集》……摆得满满当当，光是蒙田作品就有全译本、选译本等多个版本，让我们大开眼界。

马先生的工作台紧靠着窗户，一本厚厚的法文原著，一叠普通的方格稿纸，几部分门别类的法语辞典，若干不同颜色的水笔，陪伴着

先生走过寒来暑往的漫漫翻译之路。

拉上窗帘，打开台灯，书房的氛围静谧而安详，马振骋就是在这里，将法兰西文化的种子播撒到中文世界。

一部《小王子》，让我们领略到法国文学纯美动人的艺术境界，也让众多中国读者知晓圣埃克苏佩里的名字。

其实，早在1981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就出版了圣埃克苏佩里的小说集《夜航》，其中中篇小说《人的大地》是由马振骋独立翻译完成的。

1999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又以《人的大地》为名，结集出版了马振骋翻译的圣埃克苏佩里的4部小说《小王子》《夜航》《人的大地》《空军飞行员》，之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新版本，也长销不衰。

值得一提的是，《小王子》一书虽曾有20多个不同的译本，但在众多法国文学爱好者眼中，最早的马振骋的译本是最权威的。

先生的书架上整齐摆放着好几座奖杯，其中分量最重的当属2009年首届傅雷翻译出版奖。

这个奖项由法国驻华使馆资助设立，专门用于奖励中国年度翻译出版的最优秀的法语图书，首届文学类获奖作品就是由马振骋翻译的《蒙田随笔全集》，颁奖嘉宾是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著名作家勒克莱齐奥。

蒙田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人文主义思想家，马振骋先生参照的原文是法国伽利玛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蒙田全集》，好处是不经过英文译本的中介，可以精确呈现蒙田思想的精髓；难点在于，每篇随笔文字几乎都掺杂着400多年前的古典法语，全文不分段落，还频频出现其他方言和冷僻字，“看得人头皮发麻，翻起来每一句话都让人头疼”。

但马先生迎难而上，终以其深厚的中法素养、丰富的翻译经验和老到的译笔，独自完成了《蒙田随笔全集》3大卷共107章80万字的翻译工作。



记得钱锺书先生曾说过，翻译让原作得以“投胎转世”，躯壳虽然“换了一个”，但精神韵致“依然故我”。

妙哉斯言！正因为有马振骋这样博学、睿智、有恒心的译者，才让蒙田的精神生命在中文世界得以再生和延续，并且焕发出新的神采。

在这间处处散发着法兰西文化魅力的小书房里，马先生和我们聊蒙田、谈翻译、话人生、品读书，还不时地递上精致可口的饼干和糖果等小点心。

几十年如一日与书相伴的人生阅历，赋予了马先生风趣幽默的话语风格，他常常寓庄于谐地说出一些意味深长而又富含哲理的话。

记得当时我们为打扰了他的休息而深感抱歉，马先生却调侃道：“勿要紧。有一句法国谚语你们听说过吗——疯子碰头越多越开心！”逗得我们忍俊不禁，一下子拉近了和他的距离。谈笑间，快乐的氛围洋溢在书房内外。

我抓住机会，将事先准备好的《蒙田随笔全集》递了上去，请先生签名留念，先生一看是限量发行的精装毛边本，非常高兴地说道：“我们都是爱书人，我送你一句蒙田的话吧。”于是提笔写下“书籍是人给自己创造的太阳。马振骋”。

走出马先生的家已是华灯初上。繁华的都市跳动着快节奏的脉搏，而我的心还依旧徜徉在法语文化的世界里，久久沉醉。



马振骋在《蒙田随笔全集》上的题字



贾平凹在乡村

真情记录乡土变迁

半塘月

大作家贾平凹，是乡村文学的“土豪”，他的一系列作品都以浓郁的乡村生活为背景去书写，如《老生》《带灯》，再到今天的《极花》（《人民文学》2016年第1期），无不如此。《极花》中涉及的法律和人性人情之间对立的矛盾纠结，更让贾平凹对乡村的书写更加深刻。

《极花》写了一个被拐卖女孩的遭遇及其心灵、心理的“演变史”。被人贩子拐卖到贫穷落后乡村的胡蝶姑娘，起先拼死抵抗，渐渐被潜移默化直至“同化”：日子慢慢流逝，她渐渐熟悉适应了这里，并不知不觉“爱”上了这个闭塞、穷困的山村，依赖上了这个山村里愚昧、自私、粗野但不乏憨厚、朴实的邻里乡亲，包括把她买来、给她带来屈辱和痛苦的“丈夫”，也越来越放不下她被强暴的产物——儿子“兔子”。当警察及父母想方设法把她解救回去后，她经不住社会的压力和内心的情感，最后又重新回到被拐卖的地方。

《极花》发表后，一篇评论文章从法律角度说，故事里的人物都在犯罪。对此，贾平凹回答说，他无意去讨论谁犯罪，首先想关注的中国社会最底层人的生活状态。在关注主人公胡蝶遭遇的同时，贾平凹也在尝试走进黑亮的内心，呈现这一类人群面对的困境，他所关注的正是农村凋敝后农村人所面临的尴尬窘境。

这部作品用全息体验的方式叙述女孩的遭遇，展示了她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和经历的内心煎熬，小说中的极花、血葱、何首乌、星象、石磨、水井、走山、剪纸等物象，甚至人物的名字如胡蝶、老老、黑亮、半语子等，都有所映射，有所特指，集中反映了农村文明凋敝的触目惊心和城市物质欲望对乡村的蚕食，一起构成了“意象”。如贾平凹自己所言，“整个的故事又是象征，再加上这些意象的成分渲染，从而达到一种虚的东西”。

贾平凹以往的作品，几乎都是线性结构发展，而这次是写成了一团一块，字数大大压缩，变成最短的一部长篇。细细品读后我们发现，贾平凹是在用中国传统绘画的方式来写小说。绘画中的留白、意蕴等都被借鉴到小说中的写法中去，许多东西，细品之下才可发现真味道，往往有言外之意和象外之象。贾平凹自己也曾说：“我一直以为我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以水墨而文学，文学是水墨的。”

文学评论家陈思和曾形容贾平凹是“一头沙漠里的骆驼”。的确，30多年来，贾平凹笔耕不辍，艰难地跋涉在现实生活的泥淖之上，细致入微地反映当代乡村的急剧变化，隐含着极大的社会历史信息量，是研究农村问题的良好“文本”。其中，就包括了这篇《极花》。

小人书陪伴的童年

潘爱娅

小人书，也叫连环画，现在的小孩子很难有机会见识到了。提到它，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会感到亲切。

我的童年时期是不讲究读书的。填饱了肚子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挖野菜、扒柴，帮家中做家务。读到二、三年级认识了几个字，我和伙伴们接触到小人书，也就迷上了。在上学路上，挖野菜田埂上，我们都会把自己珍藏的小人书拿出来交换着看。

《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林海雪原》《少年英雄王二小》……激荡着我们幼小的心灵。我们痛恨敌人，更痛恨像“甫志高”那样的叛徒。我们在心中模仿着那些英雄人物，女孩子希望自己成为“刘胡兰”“江姐”“赵一曼”那样的人物，男孩子希望自己是“杨子荣”或者“小兵张嘎”，与敌人斗智斗勇，想象着自己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的光辉形象。虽然还是屁大的小孩，却早就有了英雄情怀。

乡村缺少与外界沟通，无法获取更多的知识，对于世间善恶，人物美丑的见解，我基

本上都是从小人书中获得的。肚子不满足，我的心灵并不空虚。有的孩子喜欢打打闹闹地玩耍，我总是手捧一本连环画。很早就知道保尔·柯察金和冬妮娅，《草原英雄小姐妹》里的龙梅和玉荣也是我所钦佩的。我沉浸在那些故事里，产生无尽的联想。小人书，引导了我的人生价值趋向。

我对小人书的痴迷，也影响了我干家务活。记得有次烧午饭，我边烧火边看小人书，竟然让燃着的柴草掉到灶洞外，险些把自己烧着了。母亲气不过，夺了我的小人书放到灶洞里烧了。这书是借人家的，我无法还人家的书了。当时这件事情是怎么解决的已不记得，记得的是，我心灵很受伤。

话说小人书，其实并不小，它包罗了世间万象。对于我来说，成长在不要文化的年代里，很多文学、地理、历史的知识，都是从小人书里得到的。它们像一面面的镜子，又像太阳月亮，照亮了我的心房，映照着我成长脚步。

那一本本破旧的小人书，每一页里都留下了我的心声，留下了我成长的故事。记得我们村后有户人家，搞到了一套《五朵金花》连环画。听说《五朵金花》里有许多漂亮姑娘，而且还有写男女恋爱的，平时很冷清的房子突然就热闹起来，想看的人都涌向他家。我也看到了，很有新鲜感。这不是描写战争的，用现在的话说，是描写一群美女围绕着一位优秀青年，或者是一群青年围绕着一位美丽的姑娘，在劳动中所产生的一连串小故事。看了这书，我对爱情有了一点朦胧意识。

有小人书相伴的日子，虽贫困，却总能泛出一些美好来。如今，往事已成云烟。小人书留下的那些激动人心的人物形象，还是令我无法忘怀。

(李保军)

中国古典文献数字化追梦人

夏旻文/图

在北京房山区一个极其普通的农家院落，年逾古稀的栾贵明带领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正在完成着一项极端枯燥而且空前艰巨的任务——建立《中国古典文献数字化工程》。

在低矮简陋的平房工作间，卷帙浩繁的中国典籍与荧光闪烁的电脑屏幕交相辉映。16个春秋交替弹指而过，伴随着每天的日出日落和数次更换的主机键盘，一篇篇中国古典文献逐字逐句转化为可供研究者输入任意字词自由查找的海量电子数据。

栾贵明是我国著名文献学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64年至200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追随钱锺书先生从事学术研究35年。

1984年，在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钱锺书先生的倡议和支持下，栾贵明先生创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计算机室（1989年升格为中国社科院计算机室）并担任主任，从事中国古典文献数字化工作。经过短短数年，栾先生和他的团队研制了容纳5万多个汉字的全汉字库，而且这个字库还具备繁体字生成功能。他们利用这个科研成果编纂了《论语数据库》《永乐大典索引》《全唐诗索引》。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993年，因一场内部纠纷，栾先生无辜受挫，整整6年的心血和成果被没收，付之东流，已经数字化的古典文献均被毁损，学术研究团队也遭解散。



栾贵明（左）和田奕

沉寂数年后，2000年，栾先生申请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与他在社科院的硕士生田奕等同仁招兵买马组建新团队，继续实施中国古典文献数字化工程。因经费拮据，几经辗转，才得以将团队落户房山农村。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完成从太古时期到北宋之前的中国古典文献录入梳理工作，共计10亿多字。预计再过5年，可完成从三皇五帝到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前全部文字典籍的数据化，工程总计15亿字。

中国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树青先生曾经评价说：“中国文献博大精深，以前要找个资料，经常翻箱倒柜，非

常不便。栾贵明完成了古典文献专著数字化后，就能够实现速检。”

一位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学者说：“过去我们为了编字典，要考证一个字的由来和演变，需要找来很多很多的书，做大量卡片，通过积累以后才能得出一点见解。有了这样的数据库，通过计算机就能够很便捷地考证到某个字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古代典籍中的用法意义及其流变。”许多从事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研究的学者对此也深有同感。

栾先生说，为了完成恩师钱锺书先生的夙愿，他们一直在跟时间赛跑。利用拥有海量信息的“中国古典数字工程”，栾先生和他的团队还完成了《中国历史日历》《中国历史地图数据》《全唐文新编》《宋诗纪事补正》《永乐大典本水经注》《龙藏》《十三经索引》《千家诗选》、《扫叶丛书》中的《子日》《炎帝集》《黄帝集》《老子集》《列子集》《庄子集》《孙子集》《鬼谷子集》《皇甫谧集》《李淳风集》《姚广孝集》等一大批科研成果。钱先生过世后，杨绛先生始终关心“中国古典数字工程”的进展情况，她还曾在田奕陪同下专程到驻地看望这个默默无闻、兢兢业业的工作团队，并为《宋诗纪事补正》题写了书名。

今年初夏的一个周末，天气闷热。我早晨从北京城里出发，遇上郊外旅游的滚滚车流，到了房山区这个农家小院，已是中午时分。像往常一样，栾先生和他的团队成员们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走进简陋的食堂，每人一碗炸酱面配一杯绿豆汤就是全部午饭，我也有幸享受了这个“待遇”。

饭后畅叙，栾先生谈起他的研究成果和未来规划，这位背部已驼、满头银发的老者眼神中闪烁着孩子般乐观纯真的光芒。田奕女士坐在旁边，偶尔轻声插话。回忆起30年来艰辛努力、筚路蓝缕的往事，田女士语气平和，仿佛在叙述2000多年前的中国历史般理所当然，无怨无悔。

报告文学《大国担当》聚焦我国援塞抗击埃博拉

2014年春，超级病毒埃博拉席卷非洲，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惨遭吞噬。2014年9月至次年3月，解放军第302医院抽组114名队员，分3批在西非塞拉利昂疫区接力奋战185天，之后，我国又从江苏、湖南组建医疗队援塞抗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卫生援外行动，实现了“打胜仗、零感染”的目标，赢得了世界卫

生组织、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赞誉。

王锦秋、洪建国两位援塞医疗队员，深入采访埃博拉患者及中塞医务人员、塞拉利昂政府官员等，积累大量素材，历时1年创作出39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担当》（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